

西厢桃花别样红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海上谈艺录

蒋星煜

尹永华 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蒋星煜

西厢桃花别样红

尹永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尹永华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5. 11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535-0425-4

I. ①西… II. ①尹… III. ①蒋星煜—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866号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王 刚

责任编辑 张 琦
特约编辑 刘绪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封底摄影 田 员
技术编辑 刘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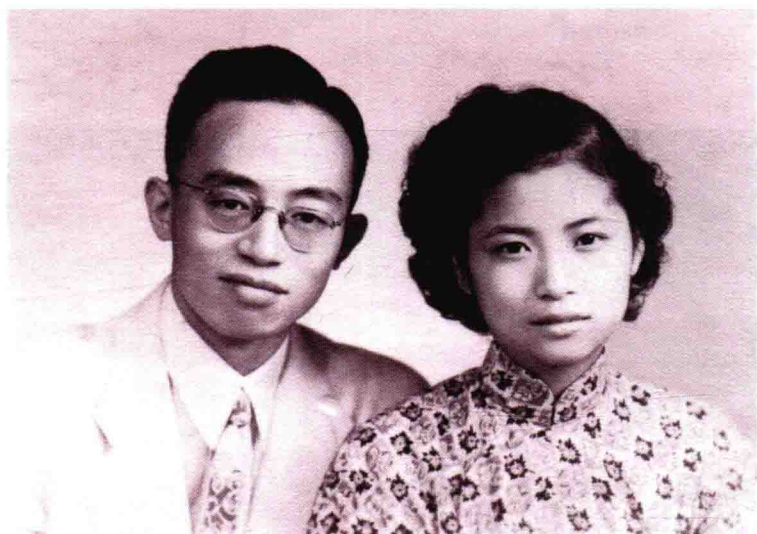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主 编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文学艺术院
书 名 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
著 者 尹永华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网 址 www.cshwh.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75 彩插:2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425-4/K.049
定 价 38.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 话 021-64366274



作家、戏曲史论家蒋星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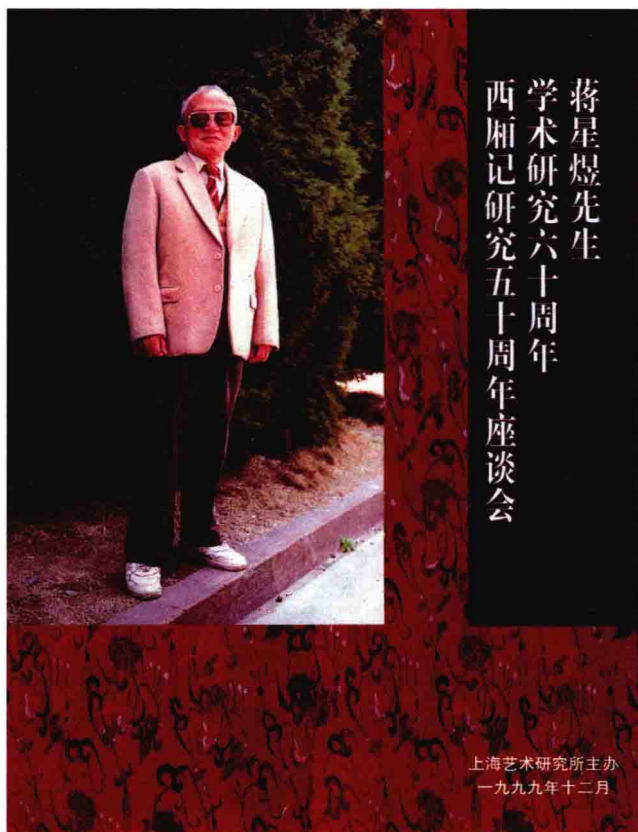
1950 年 蒋星煜与妻子王国霞



蒋星煜与孙子蒋映泉（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



80年代 蒋星煜（前排左三）与上海艺术研究所同事会见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前排左二）一行



1999年 蒋星煜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座谈会宣传册封面



1986 年 蒋星煜为山西普救寺内传说中的崔莺莺居处所题匾额



《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获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徐 麟

副主任 陈 东 施大畏 宋 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刚 王依群 许舒亚 何承伟 宋 妍

辛丽丽 沈文忠 迟志刚 张建亚 张晓敏

陈 东 尚长荣 周志高 胡国强 施大畏

徐 麟 程海宝 谭晶华 滕俊杰 穆端正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王 刚

目 录

艺术访谈

筌路蓝缕 玉汝于成	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故乡的哺育	25
第二章 弱冠年华与文字抗战	35
第三章 重庆战时的学术积淀	45
第四章 巨变前夕的选择	57
第五章 坎坷艰辛的学术生涯	69
第六章 “反右”和“文革”	77
第七章 《西厢记》研究	98
第八章 辞书编纂	110
第九章 戏曲史和《桃花扇》	120
第十章 茶香氤氲润人生	135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57
后 记	163

艺术访谈



我出生在现代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时代，年轻的时候赶上了日本人入侵中国，后来又遭逢国内战争，以后还碰上了“十年动荡”。但是，我既然有些知识，也就一定不会昧着良心说假话，因此，我被作为“臭老九”批斗时遭遇很惨，还因此被打落了全部牙齿，甚至于家破人亡，也就不甚稀奇了。但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没有其他理由，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啊，因为我热爱唐诗、宋词、元曲，我爱方块字。

中国古典诗词给了我最初的文化熏染，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唐诗、宋词、元曲爱之甚深。元曲中的散曲是我的最爱，比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牡丹亭》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这一切，陶冶了我的性格，也使我终生陶醉其中。

——蒋星煜



蒋星煜与本书作者尹永华（田员 摄）

筚路蓝缕 玉汝于成

时间：2013年2月

地点：上海梅陇蒋星煜先生寓所

受访人：蒋星煜

采访人：尹永华

2013年2月，春节刚过，便带着“任务”拜访蒋星煜先生。

蒋先生是我的祖师辈，我在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多位老师，实际上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我读大学的时候，蒋先生的文章著作属于必读类。先生的文章著作鞭辟入里，既厚积薄发又娓娓道来，在汗牛充栋的戏剧史论著作中，有着自己独具的品格，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们诸多滋养与启示。

后来大学毕业在媒体单位工作，多次采访先生，要么在各种学术研讨会现场，要么就偷懒干脆通过电话完成，常是赶任务的状态，后来每每想起，也多有自责。2011年，研究生的同学要撰写中国戏曲史论专著，我们彻夜长谈，话题自然到了先生这里，夜已深，万籁俱寂，说起先生时年已逾九十，不禁浑身一凛，心底油然而生感慨。同时，就更加盼望着有缘尽快再睹先生风采。

随之，心想事成，“海上谈艺录”丛书提供了机缘，可以一了心愿。

此刻，蒋先生的客厅。午后的早春阳光，虽有一点怯怯，但坚韧中蔓延出温暖。茶香氤氲，聊到兴起，先生为我们打开音响，《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充盈了这间书香、茶香交汇的小小客厅。

.....

生命不息，创造力永在。

我们的工作，就此展开。

不拘一格 自成体系

尹永华（以下简称尹）：蒋老，您一生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工作，而且很早（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写作，您认为，您一生从事这项工作，是天赋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后天的喜好多一些？

蒋星煜（以下简称蒋）：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古希腊的神话和艺术是人类

童年时代美丽的事，具有永恒性的魅力。”这话也可以用在在我这里，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也许我生来就有一点文艺的细胞吧，从读书识字开始，我就觉得听故事、听唱歌、看舞蹈等等非常有趣，在我眼里有着无尽的魅力。我一直就十分喜爱这些文艺形式，但并不是满足于加以模仿，或者是参加一下表演，而是情不自禁地加以品头论足。如果一定要找出个不一样来，这一点，就算是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吧。

我庆幸我有一位可以带我发蒙的外祖父，自小我就受到他的巨大影响。我的外祖父是一名前清的秀才，但思想却一点也不保守。他不仅思想开明，而且极有个性魅力，做事有自己的想法。我刚学会走路，他就领着我泡茶馆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茶馆接触到了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物。还记得童年时期，外祖父带着我沿着溧阳的城墙散步，看见许多家庭以外活生生的事物，耳濡目染的作用不可小觑。外祖父也讲给我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典故。后来让我终生受用的，还有外祖父时常给我讲的一些历史故事和唐诗，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我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到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读了当时出版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一些著作，以及许多外国文艺作品等，当时就觉得受益匪浅，后来更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奠基作用。

尹：您很早就介入文艺活动，是纯粹自发的还是家庭学校强迫的呢？

蒋：（笑）当时的学校和家庭还不像现在这样，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甚至用打骂体罚的办法，以致孩子产生厌恶和对抗心理。那时候学校以引导为主，仅提供一点必要的条件而已。我始终觉得激发一个人对于文艺活动的浓厚兴趣最为重要。我记得在我幼年时候，溧阳就有规模比较大的小学，如溧阳书院小学等，每学期结束的时候，都会召开一个“恳亲会”，由学校组织老师、同学们表演节目，再邀请家长代表出席，算是每年一度固定的一个仪式，但却是同学们最热切盼望着的。其实，这个“恳亲会”也就相当于现在流行的学校和家长联谊性质的文艺活动。我最早写的评论文字，内容就是围绕“恳亲会”文艺表演的各类节目，溧阳本地的报纸收到后每次都会全文照发。早期评论文字的发表，我始终认为，是对我当时写作的一种肯定。更为重要的是，对我以后以写作为职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尹：您迄今已经深入到多项艺术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都与您很早就介入多项文艺活动大有关系。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与今天教育中推行的素质教育有些一脉相承，您对此有些什么体会呢？

蒋：我始终觉得激发一个人对于文艺活动的浓厚兴趣最为重要。我是在邻县宜

兴读的初中一年级，表舅周陞勋当时是在读高二，表哥王秉禹是在读初三，他们都对文学艺术之类深有兴趣。学校的全名是“江苏省公立宜兴农林职业学校”，学生全部住读，而且都是男生，但是，在这所冠名“农林职业学校”的校园里，却有一个一般人想不到的特点，就是学校的文艺气氛极其浓郁，当然，这个学校每年也都会举办“恳亲会”，而且规模会更大一些。

我认为适当的文艺活动实践，对一个孩子想象力的激发具有重要作用。记得在一次学校的“恳亲会”上，学生自己组织演出了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沈凤喜由学校的撑竿跳冠军汤瀚章扮演，关秀姑、何丽娜也全部都由男生扮演，虽然都是反串角色，但是演出却非常精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表舅周陞勋那里读到了不少书，其中就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胡适的许多著作。读这些书，都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读胡适的著作，对我以后到重庆工作，更是有直接的帮助。

尹：蒋老，您之所以被称为上海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个原因是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且都颇有成就，您认为自己主要涉猎的领域是哪些？

蒋：在文化领域，我对书法、国画、舞蹈、杂技、古典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大都以欣赏为主，但对于书法，则用了些苦功。我先是写了《瘞鹤铭》，后来也临摹了《多宝塔》、《东方朔画像赞》等颜真卿的碑帖，这些碑帖都是正楷。行书则是写了钱南园《枯树赋》。二十五岁那年，我完成了《颜鲁公之书学》这部书法论著。国画我也很是喜欢，我还曾经学过山水画，但是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一直觉得很遗憾的是，我对山水画没有能够做到持之以恒。

有意思的是，我的戏曲史著作的写作、出版则多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时候，我基本上完全离开了行政岗位，这才开始有了大块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能够安心自如地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就把时间用来整理自己的文章、书稿，随后陆续发表和出版。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国家一直比较注重戏曲的教育功能，却只有极少数的人对过去数目的戏曲史料，包括各种文集、诗集、方志、家谱中的史料去进行挖掘，进行一些必要的史料考证和整理工作。很长一段时期内，我看全国范围之内，也只有任二北、徐朔方等少数几位在这方面努力。赵景深先生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但别人来请教，他可以热心地提供些许线索，甚或做一些指点。于是，我自己定下心来，决心在古典戏曲的版本、目录方面做一点工作。在给自己的研究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之后，我初步确定的重点是《西厢记》和辽代戏曲两大版块。至于我的研究成果是否被大家承认，我倒是从未加以考虑。当然，“文革”之后，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1984年我的《西厢记》

研究著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获得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这对我是一个肯定和鼓舞。

尹：人们常说，学术生涯早期遇到的良师益友，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莫大的作用。刚才说了外祖父，其他还有哪些人呢？

蒋：我研究书法并出版《颜鲁公之书学》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当时，在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有位沈子善教授，那个时候他正在异常艰辛的情况下编《中国书学》杂志，我当时在重庆北温泉跟他有些联系，他得知我写了一本研究书法艺术的专著《颜鲁公之书学》之后，就要去仔细看了，看完认为这本书是花了苦功的，也表示他对这本书很有些兴趣，就选发了此书的一个章节。当然，因为条件所限，发表了也是没有稿费的，就只有两本样书，但当时的我已经很满足了。这种感受可能很多年轻学者都有，那就是最初看到自己文字变成铅字的愉悦感幸福感。也大约是在这个时候，这本书几经辗转到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先生手里，他也肯定了我的这本著作。这以后，乐于提携后学的李石曾为此书稿还操了不少心，但是，因为战乱，出版此书也还是不容易的，直到李石曾成了世界书局的董事长，才最终决定由世界书局出版此书稿。1948年，几经周折，《颜鲁公之书学》终于由世界书局出版问世，这也是我继194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的第二本学术专著。

尹：现在很多学者撰写论文、出版专著，目的其实就是拿学位、评职称，博得一个浮泛名号。您从事学术研究的初衷是什么呢？

蒋：我时常想，历史再发展一二百年，世人也许才会对现在的学术成果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果没有这些评价，那样倒也无所谓。对于我而言，做了一点实际工作，我觉得几十年的粮食没有白吃，对得起种庄稼的农民就可以了，心里也就有了一些安慰。对关汉卿，对王实甫，有一些研究心得，对我来说，这比中了任何大奖都更加开心。

其实，我也根本不要求得到大家承认什么的，我既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长”啊、“主任”啊、“主席”啊，就连副职的头衔也没有，而且要圈外人承认你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因为他们不了解。当然，在圈子里面也难。除了作协、剧协，我没有参加任何文艺团体。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把那些开会、投票、喝酒聚餐的时间就都用在读书、写作上了。

比如说戏曲史研究吧，有的人说起来也算是戏曲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但他们从未接触第一手的材料，也并没有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他们承认不承认我的成果，

无关紧要。何况，就是承认了，这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我倒是真无所谓。

尹：蒋老，您的学术环境一直不是象牙塔，甚至可以说常常是处在逆境中做学问，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呢？

蒋：的确，我的学术生涯很多次遭逢逆境。比如“反右”，比如“文革”等等。但是，很多次，我遇到了还不错的同志、领导，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关照。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工作不久，曾经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后来担任中国剧协秘书长的伊兵，还有曾经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李太成，他们对我在业务上非常信任，在政治上也不存在任何怀疑。当然还有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他们都经常和我探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尹：蒋老，您在许多领域已经卓有成就了，声誉有时候也会成为负担，可您始终很是淡泊，您是怎么考虑这些的？

蒋：声誉与金钱一样，都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现在大家认为我对《西厢记》做了不少研究工作，那也是事实。恐怕还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因为我在祖国宝岛台湾也出版了有关《西厢记》的著作，在日本又出版了著作的手迹影印本，并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西厢记》专家有些交往，在宝岛台湾及日本的《西厢记》研究领域也有了一点影响，以致人家对我的看法有些改变。好比商品畅销了，评价自然也就随之提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对《西厢记》的研究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当然，实地考察普救寺旧址，研究“西厢”的位置，探讨《西厢记》对《金瓶梅》、《红楼梦》的多方面影响，并确认“红娘”这一名词在现代生活中的广泛使用等等，也都是前人所没有涉及过的。至于书法研究，因为《颜鲁公之书学》首版是在解放前出的，以至于大家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本书，而我至今也不是任何书法家组织的成员。我本来不搞戏曲，以致到“文革”结束，许多人都还一直以为我不过是个戏迷而已。

“文革”结束后，作家吴强因为曾经是我的领导，对我比较了解，介绍我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那次上海作协开大会，我还被推举为古典文学组的代表上台发了言。

也是在那次会议的间隙，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两位教授神情惊异地问我：“解放前有一本《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你写的吗？”这也正反映出上海文化界对我不了解，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公认”了，对此，我倒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中国作家协会倒是了解我抗战时期在上海、重庆两地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曾经颁发给我纪念参加抗战文艺活动的奖牌。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已经是意料之外的肯定了。